

Одинокий Царь в Кремле

叶利钦传



Yelqinzhuān

[俄] 维克托·安德里亚诺夫

亚历山大·切尔尼亚克

周荣广 王少生 孙萍等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叶利钦传

(下)

维克托·安德里亚诺夫 著
亚历山大·切尔尼亚克

周荣广
王少生 等译
孙 萍

辽宁人民出版社

第十二章

黑手党政权

一位名叫费迪南德·卡莫伊的意大利作家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黑手党并建立起真正的国家。”诚然，这里指的是他自己的国家——意大利。然而，此话却有充分的理由针对叶氏的俄罗斯而言。

人们常常把黑手党和贪赃受贿称为列在立法权、执行权、司法权和护法权力之后的第五政权。但在我们俄罗斯的国度里，这第五政权却压倒了其他一切权力。法律的主要维护人——俄罗斯代理总检察长 A·伊柳申科因受贿东窗事发，只得将位于德米特罗夫卡的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换到了列福尔托沃。瑞士检察机关正对国家高层官员提起刑事诉讼。我们说：大家庭——就是指犯罪行为；我们说：犯罪行为——就是指大家庭。

政论家帕维尔·沃夏诺夫引用一位寡头人物在气急败坏之下针对司法部原部长科瓦廖夫说的一句话：“什么话都不能对他说！我对他讲的是正经事，他却跟我讲法律！”

像科瓦廖夫、内务部前部长库利科夫、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总军事检察院监察处处长巴格拉耶夫将军这样一些人，都被第五政权逐步排挤出局。第五政权需要随时准备执行克里姆林宫任何命令，甚至是完全违法的命令的糊涂虫。

所有在莫斯科看见过对白宫开炮的人都困惑莫解：为什么要用坦克向国会大楼上层开炮？问题很简单：执行者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在第10—12层上存放着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全部档案资料；那里有鲁茨科伊的皮箱，里面装着“败坏”叶利钦集团声誉的材料；有关于“私有化”问题的全部材料及当局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的其他案卷。许多文件都被大火吞没，但还有些许得以幸免……

您可曾想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这儿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寡头们的钱是从哪里得来的？是靠劳动挣来的吗？在哪儿？现在您明白为什么要流血和放火烧白宫了吧？

皮鲁士式^①的胜利

美国电视台向全世界，包括俄罗斯报道了俄罗斯议会遭到炮击的事件。成千上万的同胞为之痛心。那些日子，药房里人们最常询问的药是伐力多、缬草酊、氯霉素滴剂等……10月3日，莫斯科到处风传，说东政教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难以承受教民们遭受的苦难而心肌梗死，然而，感谢上帝，事情没到这种地步——只是一次较重的心脏病发作……

克里姆林宫里庆贺了胜利。宴会上时而响起碰杯的声音：“为我们的胜利干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帕维尔·格拉乔夫忙里忙外，试图弥补他与总统之间出现的裂痕。宴会直到深夜才结束。叶利钦过度“超载”地离开克里姆林宫。第二天，他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和往常一样，严峻的形势过后，他又陷入了抑郁状态，尽管这一次没有多久。侍从们没有让他松弛下来。对他的鼓动来自四面八方，要求他马不停蹄地干到底，立即打跨“共产主义恶棍”，组织“纽伦堡审判”，解散可

恶的苏维埃政权。

菲拉托夫尤为卖力。他也是请求上司宽恕的一个，当时他惊慌失措，曾劝说叶利钦撤销第 1400 号命令。而现在，他却极力表现自己的绝对忠诚，试图挽回影响。很快便拟就了关于俄罗斯国旗、宪法法院、总检察官等的命令。正如人们传说那样，还有拆除列宁墓的文件草案，但最终还是没有形成正式命令。

斯捷潘科夫的命运，如读者记得的那样，决定得还要早。当时，斯捷潘科夫得到了切尔诺梅尔金的关照。但在尔后的一系列事件中，总检察长却惘然若失——在法律字面上的意义和叶利钦的指示之间辗转不安。在签发鲁茨科伊、哈斯拉托夫及其战友们的逮捕证的问题上磨磨蹭蹭、慢慢吞吞。

还在 10 月 4 日，攻打白宫刚刚开始，早晨 7 时 30 分叶利钦就打电话给鄂木斯克的阿列克谢·卡赞尼克，提出让他担任俄罗斯总检察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总统说，“我们需要最大限度的法制，最大限度的人道主义，最大限度的公正。将有很多的工作要我们去做”。卡赞尼克后来发现，当时他可能是直觉地说明任何一个法官应当具备的品质。反复斟酌再三之后，鄂木斯克人劝总统不要操之过急，应当找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担任。然而，他听到的回答却是：

“立即乘飞机赶来莫斯科。直接到科里姆林宫我的办公室”。

一贯奉公守法，天真质朴的“堂·吉珂德”还能做什么呢？他立即奔向航空站。从这里到莫斯科要飞很长时间，当然，即使在电视里也看不见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突然间，机组人员获得情报，说飞机上装有炸弹，只好在下诺夫哥罗德降落搜寻。简单截说，卡赞尼克 10 月 5 日才到达莫斯科。依照原来的吩咐，他直奔克里姆林宫，但因主人不在，科尔扎科夫接待了他。将军开门见山地阐明：

“到总检察院去上任吧，我和巴尔苏科夫亲自去介绍。”

听了卡赞尼克的讲述，巴尔苏科夫更加提高了警惕性，他用脚踢开了总检察院办公室的门。一见两个叶利钦的“火枪手”和紧随其后的卡赞尼克，斯捷潘科夫一切都明白了，他脸色变得煞白，大概内心里做了最坏的准备。科尔扎科夫命令卡赞尼克坐到斯捷潘科夫的椅子上，并目不转睛地盯住斯捷潘科夫，因为他可能藏匿某些文件……

切尔诺梅尔金和费拉托夫正在处理地方政权事务。10月5日，他们召集行政机关头头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开会，要求解散各级苏维埃，尽快准备杜马选举，建议在12月11日或12日进行。尽管人们试图提出异议，说为什么这样急三火四，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大声恫吓。而阿穆尔州和新西伯利亚州的首脑却被总统的一纸命令完全解职。

10月5日任命了安全委员会，但没有叶利钦会议就开不成，只好延期举行。只有10月6日总统才能到场。如目击者所述，他无精打采却很坚定地走进安全委员会开会的大厅。他仔细地扫视着与会者，发现了几个新面孔——盖达尔、费多罗夫、卡赞尼克。叶利钦把目光停在卡赞尼克身上，他向这位西伯利亚人点头示意。他坐下来，没说一句多余的话，直接转入正题。叶利钦曾惶恐不安，这并非笑谈。10月3日夜，军队开始动摇起来。总统仿佛成了将领们的人质。他根本不想与任何人分享权力，像不能分享老婆一样。别人的权力尚可分享，然而这是我自己的？！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10月3—4日，许多军用载重汽车从莫斯科郊区的卫戍部队——从诺金斯克、波多利斯克等地运来了志愿者，用以保卫白宫。总之，有充分理由严厉提出关于俄罗斯军事学说问题。叶利钦委托洛博夫和格拉乔夫去准备像他强调指出的高质量的文件，因为关于军事学说的谈话很多，而有见的发言却很少，军队不了解自己的职能，因而将领们反复强调，军人应超然政治之外。

格拉乔夫还记得，当他请求下达攻打白宫的书面命令时，

叶利钦灌输给他的是什么样的观点。而如今，为了消除军队难以掌握的印象，国防部长陈述了保护军人的意见，并作出了承诺：他们将始终不渝地听从总统的调遣和争取荣誉。叶利钦对这一提案表示认同。

军队起码是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么现在政权又将如何呢？坦克炮对白宫的齐射震撼了政权的整个结构，从上到下，到处是裂痕。最高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了，议会——最高苏维埃也没有了。个别地方的苏维埃即使在位也情绪消沉、萎靡不振了。尽管在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谁也没有公开谈论，但每个人心里明镜似的：国家发生了政变。法律体系遭到事实上的破坏——坏也罢，好也罢，它总能够调节政治程序乃至国家的全部生活。解散代表大会和议会之后，叶利钦把旧宪法放上了十字架。

俄罗斯形势反常。莫斯科大学教授С·阿瓦基扬看得很准：“В·Н·叶利钦依据何种宪法法律原则继续履行总统职责，颁布新的命令？天哪，真是厚颜无耻，他们靠的是权力！宪法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就算我们会同意他这样做，可 В·Н·叶利钦在自己的命令中还引用宪法的条文。这就是说宪法仍然有效。那么，奉公守法的公民们就有权发问：“到底谁是法定的总统——是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位，还是列福尔托沃病室中的那位？”

这就是叶利钦急切需要新宪法的根本原因。于是投其所好的法学家和政治家们就搞出个新宪法来。只差颁布实施了。叶利钦集团尽量把联邦会议选举往前赶，把它与对宪法的全民投票放在一块进行。有人对叶利钦说，把两个运动——选举和公民投票放在一块进行大有好处，各党派将互相隐瞒，力争收集到更多的选票，从而进入杜马，而宪法则仿佛退到阴影之中，居次要地位，就容易通过了，这种做法十拿九稳，毫无问题。

急三火四的原因很多。第一，如上所说，总统及其幕僚们感到了自己的不合法性。第二，迫于西方的压力。由于在自己眼皮底下炮击了人民选举的议会，那些“文明”国家要求，这

一次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实行“民主”选举。为此，克林顿行政当局竟慷慨解囊——1993年10月23日通过决议，资助叶利钦800—1000万美元。

叶利钦急于尽快选举的原因，还在于民主派营垒中，其嫡系内部开始闹内讧。“俄罗斯的选择”对自己的幕后内阁已经有了打算（总理——盖达尔，国防部长——科别茨，外交部长——科济列夫，等等）。而亚夫林斯基的周围也聚集着一群竞争者——以前是有头有脸的而后来却受到总统贬斥的人们。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亚博卢”集团，前副总理亚夫林斯基本人、曾任总统直属监察局局长的博尔德列夫和前任驻美大使卢金在其中居领导地位。

总统非常希望各方面都向他反复强调的“俄罗斯的选择”获得成功。一旦取得胜利，就能巩固政权，就可以提出于1994年春季或夏季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叶利钦对这一步提心吊胆：刚刚炮击了白宫，伤口还没有结疤，这时去竞选等于自杀。但同时，支持和在新的日期改选对他倒是个安慰。更主要的——可以放手去实施新的行动。

幕僚们心领神会，尽所能鼓励叶利钦。就在这次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洛博夫宣布，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支持总统。

洛博夫话音未落，沙赫赖立即响应：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会百分之百当选的。”

帕维尔·格拉乔夫急于挂号：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百分之一百五十地相信——您一定胜利！”

于是，没完没了，一个赛过一个。叶利钦打起了精神，温厚地向那些溜须拍马的能手们频频点头。然而只有一个人冒险出格，那就是卡赞尼克。他说：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形势并不那么简单。社会秩序，往轻里说，希望能更好一些。总检察长在问题的重压下呻吟。我坚信，我们有胜利的可能性，但如果您能向犯罪行为 and 贪污

受贿现象宣战，这种可能性会更大。犯罪和贪污受贿仿佛庄稼的锈病侵蚀着国家。”

面对卡赞尼克的发言，叶利钦的脸色变白，继而从长桌对面向总检察长送来了强硬的声音：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觉得您就爱搞些悲观的预测。”

安全委员会会议结束时，叶利钦责成菲拉托夫拟制国家杜马选举的章程，这个章程从根本上改变了选举的规则。决定12月12日为投票日。暂时停止了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及“自由俄罗斯”人民党的活动。

11月8日，叶利钦签署了俄罗斯宪法草案，准备12月12日提交公民投票表决。为了让总统满意，在新的基本法律的拟制上，沙赫赖、巴图林、图马诺夫、萨塔罗夫、阿列克谢耶夫等人正儿八经地辛苦了一阵子。

在某个澡堂里带着醉意谋划，在莫斯科市中心坦克炮的轰鸣声中孕育的第五届杜马于1993年12月匆忙早产问世，还有叶利钦的宪法。

选举后的那天夜里，叶利钦几乎没有睡觉，他等待着第一批结果。克里姆林宫里组织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迎接“新的政治年”，并进行了电视直播。盖达尔高声宣布，“俄罗斯的选择”至少赢得了38%的选票。科斯季科夫竭力让人们相信，这是“民主政治的重大胜利”。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也以他从未有过的激情预言道：“我们将进入新的时代，一个俄罗斯新一辈人幻想的时代。我祝贺大家！我们现在拥有建立强大国家的坚实基础！伟大的俄罗斯已经属于我们议会主义者！这是民主政治的大喜事！”B·布拉金也因“心满意足”的感觉而精神焕发，他激动地大喊大叫：“我们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了！”

然而，得到的情报越多，庆祝会就越变得索然无味。民主派们经受了严酷的失败。自由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农民党统统离开了他们。

由于，“俄罗斯的选择”作为总统党出现，国家也这样对

待叶利钦。而且，不仅这样对待叶利钦，也同样对待他所有的幕僚们，像盖达尔、布尔布利斯、舒梅科、丘拜斯、科济列夫……“俄罗斯的选择”赢得了15%的选票，“亚博卢”集团为7.5%，“普列斯”6.5%。

对宪法的公民投票尽管似乎已经通过，但并没有令叶利钦满意。

目击者的叙述。

俄罗斯联邦总统原新闻秘书B·科斯季科夫：

“12月13日早晨11时左右，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里亚博夫带着一份私人报告来到克里姆林宫。他神情激动异常。叶利钦不顾民主派们的反对，安排这位哈斯拉托夫从前的亲密战友做了有威望的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头头。在叶利钦的圈子里，人们都说他是个阴险狡猾，口蜜腹剑之人。列夫·苏哈诺夫评价说‘连私人司机都离他而去，不想和他一起共事。他是个可怕的万人嫌。’然而，叶利钦任用此人，似乎有个人的打算。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处理很紧密。里亚博夫破釜沉舟当了反对派，如今他一心一意投靠总统，而且明显地在总统面前提心吊胆。

公民投票的最终结果还没有公布，因为我知道里亚博夫要到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这里来，我与他们会见之前，差一分钟10点来到总统会客室。里亚博夫已经在那里了。他手里拿着上等山羊革做的棒状物，并神经质地把它从一只手移到另一只手里。

‘有什么让新闻记者高兴的吗？’我问他，同时用目光示意那棒状物。

里亚博夫一面表示了对新闻秘书的关心，一面打开了棒状物，那里面放着惟一的一张纸。

这是一份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文件，它的标题令人心烦，叫做《初步的结果》，然而，这份文件的历史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它空口无凭地确认了新宪法的通过。

文件里写满了数目字：登记人数(105 284人)和参加投票的选民数(55 987人)，赞成通过宪法的票数(29 337票)。

根据对初步数据的推算，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有 50% 以上参加投票的选民赞成通过宪法。最终数据将另行公布。

里亚博夫钻进总统办公室，15—20 分钟后从那里走出来。这一天我再没有看见他。

然而，就在那一天，于两三个小时后，塔斯社的官方新闻通报中播发了一则消息，应当说这则消息使我有些困惑莫解。

中央选举委员会今天确认……55% 参加投票的选民中，有近 60% 的人投票赞成基本法律。

投票赞成宪法的占‘50% 以上’，被视为‘近 60%’，这就明显地修改了投票结果，并将修改后的结果写进所有的官方文件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可能在里亚博夫与总统谈话过去数小时后，又收到了新的数据，中央选举委员会高效率地进行了通报。

但是，数天后我有幸看到了那份文件的复制本，就是里亚博夫带给总统的那一份。上面提到的修改是用自来水笔加进去的。对于笔相家来说，根据笔迹很容易确定是谁修改的。然而我并不是笔相家。

当然，这一修改本身丝毫没有改变通过宪法的事实。

然而，这一事件无疑能证明，选票统计和选举结果公布系统不完善到何种程度。有可能对选举委员会施加政治和物质压力的地方政权恶势力，特别是在遥远地区，将产生严重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在总统与‘俄罗斯的选择’党团的一次会见(1994 年 4 月 4 日)时，当时的总统直属人权委员会主席谢尔盖·科瓦廖夫宣布一个惊人的数字：国家杜马选举期间，总共有假选票 800 万张。他还强调指出：‘这种现象并未得到应有的处罚。’

总统及其幕僚们希望新的议会能有助于改革运动，但却没

有实现。看来新的议会中，总统无人可以依靠。这可能是繁重斗争的一个新阶段。对叶利钦来说，是新的心理负担。看得出，由于感到自己的胜利有限，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就公民投票的结果向人民如实相告。只能直接劝说他做出政治声明。”

选举给叶利钦带来了许多意外的礼物。加剧了一向指望的“俄罗斯的选择”的头痛。总统的红人儿盖达尔没有证明自己能大有前途。日里诺夫斯基博得的声望使人为之震惊。克里姆林宫紧急召集智囊人物，以便帮助总统制定对待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而利夫希茨则一再坚持，总统不要把日里诺夫斯基放在心上。还有人建议“半年内消灭稀奇古怪的现象”。

选举结束后，叶利钦的圈子里来了一些新人—— Θ ·派因、Л·斯米里亚金、Г·萨塔罗夫、А·利夫希茨、М·克拉斯诺夫等，都成了叶的帮手。因而叶利钦最终抛弃了他的一些老战友。М·波尔托拉宁被解除了联邦新闻中心的领导职务。官方的说法是“因为被选为国家杜马代表”，而实际上是由于切尔诺梅尔金的坚持。攻打白宫之后，切尔诺梅尔金的影响明显扩大。维亚切斯拉夫·布拉金被打发退休了，在攻打奥斯坦基诺时他精神萎靡，表现欠佳。出版部的工作责成副总理弗拉基米尔·舒梅科照料。实际上他很快便成了联邦院的首脑，来出版部任职的是鲍里斯·米罗诺夫，但任期很短。没有在新的随员簿上注册的还有一位老朋友，那就是奥利列格·洛博夫。叶利钦把他从安全委员会调到了经济部，然后继续下放。正如总统新闻秘书挖苦的那样，洛博夫的积极因素用肉眼是很难发现的。他在政治上的主要原则像是借鉴了医生的规章——“别受伤害”。

盖达尔走了一步意想不到的险棋。尽管“俄罗斯的选择”已经垮台，叶利钦还是推荐他担任副总理职务。叶戈鲁什卡千恩万谢地接受了叶的举荐，然后却迫不急待地举行了新闻记者招待会，并宣布辞职。显然，这是得到上司赞同的。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盖达尔作为反对派想取得批评政府的行动自由，并迅速戴上社会舆论的眼镜。到那时，切尔诺梅尔金内阁必然会威信扫地，进而给叶利钦提供一个改变人事安排的机会。

盖达尔的辞职对叶利钦是个沉重的打击。不知是因为他父亲般地对叶戈尔恋恋不舍，还是因为他敬重叶戈尔的渊博学识（列昂尼德·舍巴尔申，过去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的局长，他在记录自己格言的一个小本子里记下了“反常新闻”：“叶利钦称盖达尔是聪明人，因为他知道‘宏观经济’这个词”）。奈娜·约瑟福夫娜为盖达尔的离去而悲伤不已。更有朋友比尔在暗中摆布。与叶利钦谈话后，克林顿直接在飞机上发表了“俄罗斯的改革将继续进行”的声明。这样的声明本应由俄罗斯总统来做，于是，那些在政治上缺乏经验的人们明白了，盖达尔的辞职是叶利钦和美国政府事先安排好的，要让人确信，俄罗斯的改革丝毫不会动摇。科斯季科夫承认，在和他的谈话中，叶利钦并没有隐瞒，他说在新政府组成的问题上，他和克林顿的意见是一致的。

“已经商量好了”，他对科斯季科夫说，“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多罗夫和负责私有化的阿纳托利·丘拜斯留在政府内，尽管反对派想要他们的脑袋……”

叶利钦刚刚与美国人谈妥盖达尔辞职的事，又来了个节外生枝。埃拉·帕姆菲洛娃宣布退出政府。叶利钦暴跳如雷，他要埃拉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她像个小学生一样，擦抹着脸上的泪水走出了总统办公室，但却没有拿走那份辞职声明。

显然，得知叶利钦与克林顿的谈话后，鲍里斯·费多罗夫提出了断然要求。他要求把切尔诺梅尔金的朋友、副总理扎韦留哈赶出办公室，他认为该人是“集体农庄第三院”的代表，而且竟然要取代自己以前的敌人——俄罗斯中央银行主席格拉先科。叶利钦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让他们二人臣服于费多罗夫，使部长成为副总理。费多罗夫不肯让步，并希望有人替他

说情。但他还是没有完全错打了算盘。叶利钦不得不与国家杜马打交道，因为那里准备建立一个调查 1993 年莫斯科发生的 9—10 月事件的议会委员会（这可能形成对总统的议会法庭审判），因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最终还是接受了费多罗夫的辞呈。

与此同时，叶利钦与杜马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关于大赦 1991 年和 1993 年事件中被捕参加者的决议，对于总统来说，简直成了晴天霹雳。该决议是国家杜马主席雷布金签署的，自印发之时起生效。而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份文件。2 月 24—25 日，叶利钦不共戴天的敌人哈斯拉托夫、鲁茨科伊、马卡绍夫、杜纳耶夫、捷列霍夫、安皮洛夫、巴尔卡绍夫、康斯坦丁诺夫等先后走出监狱。总统的幕僚们——科尔扎科夫、科斯季科夫、萨塔罗夫等，企图在最后时刻阻挠释放囚犯。萨哈罗夫紧急准备了总统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杜马再一次回到对问题的审理上来。叶利钦签署信件后，他亲自将信带到杜马。但为时已晚。国家杜马的决议已经生效，而且由总检察长负责执行。2 月 24 日 16 时 05 分，哈斯拉托夫获得了自由，16 时 10 分——马卡绍夫，16 时 55 分——鲁茨科伊。在尔后的数小时内，所有 74 名政治犯通通离开了牢房。

叶利钦是在巴尔维赫别墅里得到这一消息的。他与总检察长通了电话。卡赞尼克回答说，作为法律学家，作为一个公民，他不同意杜马的决定，而作为检察长，他必须执行杜马的决定。

他说：“检察长没有被赋予暂时中止大赦令的全权。”

正当叶利钦试图对卡赞尼克施加压力时，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立即宣布辞去自己的职务。

鲁茨科伊的公文包

您还记得，有一次人们请卡拉姆津用一句话定义俄罗斯国家形势时，他是怎样回答的吗？

“偷窃！”

是的，在俄罗斯到处都有偷窃。俄罗斯历史学家 H·科斯托马罗夫是这样描述罗曼诺夫王朝时代的：“罗曼诺夫王朝第一批君主两度在位时期，是官吏横行、文字狱扩大、法律失效、敲诈、欺骗、私奔、抢劫和暴动到处肆虐的时期。专制政权实际上是很少专政……”代之而来的是强权统治——彼得一世，它要根除盗窃国家财产和受贿现象。我们就以沙皇下达的关于警备司令沃尔科夫的命令为例：“因其过去的偷盗，命令将其于广场，或在泥泞之地处死，且暴尸至明春大热未到之前。”

西伯利亚总督马特维·加加林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他公款私用，靠酒类专卖权受贿，敲诈勒索从中国到俄罗斯的商队。1721年3月，总督在圣彼得堡的特罗伊茨基广场被处以绞刑。他的尸体一直悬挂至晚秋。

就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那些错把国库当成自己钱袋的人，也要受到严厉制裁。那些贪污分子、受贿者、盗用公款者、投机的人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当然也有过火行为发生，例如有的因偷了堆在田里的食物，或者两块木板，几十颗铁钉和其他一些诸如此类之物而被投入监狱或劳改营。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历史是不可修正的。然而，不论是法律、社会道德还是各种机构本身，都处于公共善意的护卫之下，叶利钦掌权以后开始出现的盗窃和抢劫，甚至在噩梦中都

无法想象。各种工厂、飞机和轮船、黄金和钻石，都被偷光了，据为已有了。

根据副总统 A·鲁茨科伊的倡议，曾建立与犯罪和贪脏受贿行为作斗争的各部门联合委员会。许多人带着呈诉状蜂拥而至，求见鲁茨科伊。很快，副总统就招架不住了——据他自己说，收集了 11 个皮箱有关贪脏受贿方面的材料。说实话，我们没有见过这些皮箱，然而我们面前却放着鲁茨科伊 1993 年 4 月 10 日在最高苏维埃所作的《关于政权高层贪脏受贿事实》的报告。下面仅是报告的一些片段。

贪污受贿侵蚀着俄罗斯，犯罪的浪潮已经迫近。这使国家基础面临毁灭的威胁。国内没有一个地区可以被认定导致犯罪环境和总体情况是稳定的。

1992 年登记在册的犯罪案件将近 250 万件，增长速度比 1990 年提高两倍。根据专家预测，到 1993 年底，应受刑事处分的案件可达 320 万件或 340 万件。就是说，每个俄罗斯人的生命实际上随时都处在某种情势的威胁之下。在俄罗斯许多城市的街道上，自动枪点射和爆炸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同时，统计在案的犯罪能有一少半被侦破。根据所有社会调查询问的资料，俄罗斯人称犯罪为第 1 号问题，而且 90% 的人都经历过为自家生命和财产安全异常惶恐不安的感觉。我想，这一点每个人都能理解。犯罪现象有如一面镜子，反映着社会的状况，首先是它的基础——经济状况。已经形成的不可容忍的、导致犯罪的形势不是别的，正是所选择的休克疗法及其主要后遗症——全国经济和政治危机的直接后果。

犯罪集团在已经洗过的阴暗资本的帮助下，形成公开犯罪的商业企业和团伙网络，专门以非法手段敛财。顺便指出，正是他们给那些希望从事诚实商业活动，把自己的资金投放到生产领域的工业财团、银行和企业造成了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极大损失。靠着把资金、原材料从国有企业转移到私人企业的犯罪

交易，进行大规模的银行投机勾当，实施非法的外币兑换和逃避纳税，他们已经积累了价值数百万乃至亿万元的财产。其中一大部分落到其个人在外国银行的账户上。根据专家的估算，仅1992年影子经济的收入，排除物价增长因素可达3—3.5万亿卢布。

有刑事和经济犯罪首领们集约化的、公然的结合，也有公职人员、执行政权的代表参与其中。结果使有组织的犯罪形成了强大的、有分支机构的体系，这一体系觊觎经济和政治领导地位。已经得到情报：国内某些庞大的黑手党集团在被收买之官员的参加下，开始研究将世界主要工业国家拨给我国的财政资金转移到自己腰包的办法。他们对稳定卢布基金特别感兴趣。在这项工作中，俄罗斯犯罪界积极勾结国外伙伴，其中包括国际黑手党。上述问题并非昨天才提到议事日程。让我们来看一看，总统和政府为了保卫国家的经济利益，维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我认为，只能根据文件与事实来评价他们的行动，就是这些文件和事实。然而这里仅有十分之一的文件和事实。根据我的建议，为了分析日益逼近的危险，防止国内的洗劫浪潮，俄罗斯总统于1991年8月20日发布第66号命令——建立保卫俄罗斯联邦经济利益委员会。当时还有可能控制形势，但在整整两年期间，由于叶戈尔·铁木罗维奇·盖达尔、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绍欣、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布尔布利斯的反对和阻挠，委员会竟没有组成。

鲁茨科伊报告的打印文本将近100页，其中列出了贪污受贿和公然勒索国家财产的具体事实，指名道姓说出了犯有贪污受贿罪的国家官员和叶利钦直近圈内的人员。他认为，一切都起源于那些号称“丰收—90”的支票。完成这一计划需要10亿美元。先是西拉耶夫政府，尔后是盖达尔政府慷慨解囊，为该计划签发了200张出口战略原料的许可证。然而总金额已经不是10亿美元了，而是50多个亿。从全苏消费合作总社的资